

管子诵读本

「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」读本编委会 编

陈永革 注释



中華書局



「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」读本系列

管子诵读本

「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」读本编委会 编
陈永革 注释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管子诵读本 / 陈永革注释; 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”读本编委会编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3.10

(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”读本系列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145 - 8

I. 管… II. ①陈… ②中… III. ①法家②《管子》—通俗读物 IV. B226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3272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管子诵读本 |
| 编 者 | 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”读本编委会 |
| 注 释 | 陈永革 |
| 丛 书 名 | 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”读本系列 |
| 责任编辑 | 祝安顺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张 6 $\frac{3}{4}$ 字数 86 千字 |
| 印 数 | 1-5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 - 7 - 101 - 09145 - 8 |
| 定 价 | 26.00 元 |
-

出版说明

读经典的书,做有根的人。雅言传承文明,经典浸润人生。诵读中华经典,是四至十二岁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,也是中央文明办、教育部、国家语委主办的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”大力推动的一项校园文化建设活动。

四至十二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,也是人生记忆的黄金阶段,这个时期诵读一定量的中华经典,不仅有助于锻炼、提高记忆力,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,学习做人、做事的基本常识,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。

为了满足广大学生、家长和教师诵读中华经典的学习需求,我们组织相关专家、学者和一线教师,编辑出版了这套“中华诵·经典诵读行动”读本。本系列图书有下述基本特点:

一、内容系统全面。

本系列图书选取蒙学经典、儒家经典、诸子百家、历史名著、经典诗文等三十八种,分四辑出版。有些经典内容过多,我们选择那些流传较广、思想深刻的篇章编成选本;有些诗文,则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进行了汇编。

二、导读言简意赅,诵读专业科学。

每本图书的正文前都有“内容导读”和“诵读指导”。“内容导读”包括对经典的成书过程、作者和作品思想等方面的综述,“诵读指导”则请播音专业的专家从朗诵角度对每本书诵读时的语气、重点和感情变化等进行指导。

三、底本权威,大字拼音,注释实用。

底本采用权威的通行本,正文原文采用三号楷体大字,符合学生阅读习惯,保护学生视力;字上用现代汉语拼音注音,拼音的标注以《汉语大字典》注音为准,在语流中发生变

调的,一律标注本来的声调;页下附有难字、难词、难句注释,注释尽量参照最新研究成果,语言简洁通俗,表述精准易懂。

四、备有诵读示范音频资料,提供免费下载。

部分图书备有由专业播音员、主持人和配音演员诵读的全本或选本的示范音频资料;条件成熟时,我们会提供一线教师的部分篇章的吟诵音频资料,供家长和教师、学生借鉴学习。鉴于光盘在运输途中容易发生损坏,我们仅提供网上免费下载诵读音频的服务。如需要图书音频资料,请购书读者将个人姓名、手机号、邮箱、所购书目、购书地点等信息发送至 songduben@126.com,即可获得该图书音频的下载网址。

关于本系列图书的使用,我们的建议和体会是:小切入,长坚持,先熟诵,后理解,家校共读出成效。

首先,家长、教师要了解经典著作的原文大意、难点注解,其中的名言警句或典故也要事先知晓大概,以便在孩子问询时能够予以帮助。

其次,家长、教师每日选择百字左右的诵读内容,带领孩子反复诵读。次日复读昨日内容,然后再开始新的内容,在学习新知识时不断温故,巩固熟读效果。

第三,在诵读时可采取听我读、跟我读、慢慢读、快快读、接力读等多种诵读形式,让孩子在集体的氛围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。

第四,教师或家长可将诵读内容做成卡片或活页,以便携带,随时复习,随时巩固。

第五,家校联手,逐次做好孩子的诵读记录。记录卡可以有诵读篇目、开始的时间、熟读的次数,还可以附上自我评价分数,家长、教师评价分数,读伴评价分数,调动一切因素激励学生熟读成诵。

本系列图书,从经典著作版本的选择到文本注音、注释的审定,都力求做到精准,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,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3年6月

内容导读

《管子》的作者、成书史考与思想解析

陈永革

一、管子其人

管仲(前 723? —前 645),名夷吾,字仲,谥号敬仲、仲父,春秋齐国颖上人(今安徽颍上管谷村),史称管子。公元前 685 年至前 645 年,担任齐相长达 40 年。他辅佐齐桓公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成为一代名相。管仲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经济思想家,更并作为中国宰相制度的奠基人而名垂青史。梁启超盛赞管子的人格理想说,“管子为忠于国民之政治家,为负责任之政治家,为能立法之政治家,为善于外交之政治家,为能实行军国主义之政治家……”^①

管仲幼年丧父,与母亲谷氏相依为命,家境虽不富裕,但受过读书习武的民间教育。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,管仲与齐相鲍叔牙为知交,并因后者向齐桓公推荐而拜封齐相,故尝慨叹“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也!”

管仲辅佐齐桓公子,以匡扶周室为己任,提出了兴霸业的“基本国策”,主张内顺民心、安民意,休养生息,制定法令,加强法度建设,否则必将导致“骤令不行,民心乃外”的不安定局面(《管子·版法》)。为此,管仲明确提出了“文治七年”的治国方略,“三年教人,四年选贤以为长,五年始兴车践乘”(《管子·戒》)。治国教民要用三年,选贤任能、培

^① 梁启超《管子评传》,《诸子集成》第5册,中华书局版,第7页。引文所称的“军国主义”,并无贬义,意指国家建设与军队建设不可偏废,不能等同于法西斯式的“军国主义”。

养干部要用四年,准备打仗则需五年。

管仲担任齐相四十年间,在辅佐齐桓公“兴修霸业”的治国实践中,较系统地形成了自己颇具创造性的国家治理思想。

首先,管仲认为,君主治理国家的要诀,最重要者莫过于顺应民心,教化人民。管子认为,“政之所兴,在顺民心。政之所废,在逆民心”(《管子·牧民》)。民心之顺逆为治国之大本。顺民心则政兴国强,逆民心则政衰国亡。

其次,治理国家必须克服私欲,率先垂范遵守国家法令,明法令,严赏罚。“凡私之所起,必生于主。”(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)如果私欲之心盛行于国,其根源必定在于君主。管仲明确指出,“为人君者,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。”(《管子·君臣下》)“有道之君,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。无道之君,既已设法,则舍法而行私者也。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,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。”(《管子·君臣上》)如果君主舍弃法度建设,或者出于私欲,虽有立法却不率先垂范遵守国家法令,下级就会假公济私,最终必将导致天下大乱。

再次,管仲极其重视劳动创造财富,特别是农业生产更是国家财富的根本支柱。主张士、农、工、商各司其职,各守其位,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。同时,要注意老百姓的税赋负担,“相地而衰征”。国家决不可对人民索取太多,否则人民和国君之间就会发生怨恨。对此,管子说,“地之生财有时,民之用力有倦,而人君之欲无穷,以有时兴有倦养无穷之君,而度量不生于其间,则上下相疾也”(《管子·权修》)。如果君主私欲极度膨胀,由于资源紧缺、民力疲惫,必将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,最终影响国家稳定。

第四,管仲所处的诸侯纷争的战国时期,国力强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力强盛。对此,管仲主张建立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,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。管子“作内政以寄军令”,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,推行“三其国而五其鄙”,兴建立郡县和“户、伍、连、里、亭、乡”基层组织。通过“畜之以道,养之以德”的组织训导,培养人民的奉献和服从精神。

最后,在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,管仲具有“综合外交”的政治思维,提出使用政治攻势、外交斡旋、军事讨伐和经济贸易“四管齐下”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战略。这种综合思维,在实践中取得了理想的效果。如管子利用大量收购圈养野鹿的手段,诱使楚国国民放弃农业生产,致使田园荒芜,粮食依靠进口。然后,齐国突然宣布停止收购野鹿,停止对楚国的粮食出口,楚国别无选择,被迫接受这一无情的现实。其治国之谋略,

于此可见一斑。

管仲内外兼修,辅佐齐桓公四十年。在他执政期间,大力推行富国强兵的国策,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,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,终成霸业。管仲的治国谋略,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对此,孔子曾慨叹说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!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孔子对管仲“尊王攘夷”、保存文化的历史评价,可谓高矣。

二、《管子》其书

《管子》一书,虽然依托管仲之名纂集而成,并非管子本人撰写,其实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,内容很庞杂,包括法家、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名家、兵家和农家等诸家的思想观点。《管子》一书,虽相传为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,但成书年代却跨度甚大,可能迟至战国秦汉之间。因此,《管子》既非出于一人之笔,亦非一时之著。

据传《管子》原书,共有 564 篇。现在版本的《管子》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,原有 86 篇,依照郭沫若、闻一多、许维遹的《管子集校》,实际现存 76 篇。其大致内容,约可分别为八类。其中,《经言》9 篇,《外言》8 篇,《内言》7 篇,《短语》17 篇,《枢言》5 篇,《杂篇》10 篇,《管子解》4 篇,《管子轻重》16 篇。

《管子》一书的形成,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。

战国时,韩非描述了《管子》成书的原因。他说:“今境内皆言治,藏管商之法者,家有之。”可见《管子》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,其主要原因是“自治”,即治国强民的办法。

《淮南子·要略》评判《管子》称:“齐桓公之时,天子卑弱,诸侯力征,南夷北狄,交伐中国,中国之不绝如线。齐国之地,东负海而北障河,地狭由少,而民多智巧。桓公忧中国之患,苦夷狄之乱,欲以存亡继绝,崇天子之位,广文、武之业,故管子之书生焉。”于此可见,《管子》一书是为适应春秋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。

此外,司马迁在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中评论说:“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《山高》《乘马》《轻重》《九府》……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,欲观其行事,故次其传。至其书,世多有之。”这一评论,反映了当时流传《管子》一书的历史情形。

在刘向编定《管子》一书之前,韩非、贾谊、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,即

“礼法并重”。因此,有人推测《管子》一书是齐国学者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。也许是刘向或其它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《管子》,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。尽管如此,《管子》一书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,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,被学者称为“研究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”。

尽管对于《管子》一书的作者,目前尚无定论,但《管子》在汉代以前即已成书,实无可争议。但对于管仲是否为《管子》一书的作者问题,自汉代以后,即颇多怀疑。如《〈汉书·艺文志〉考证》,引晋傅玄(217—278)说,“《管子》之书,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”。降及唐宗,怀疑《管子》非管仲所作者,日益增多。如唐孔颖达认为,《轻重》当为后人所加。宋代文士叶梦得(1077—1148)则认为,《管子》一书为战国末期法家的作品,“其间颇多与《鬼谷子》相乱。管子自序其事,亦泛滥不切,疑皆战国策士相附益”。清代大学者章学诚(1738—1801)在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说:“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,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,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。记管子之言行,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,而非管仲所著者也。……古人并无私人著书之事,皆是后人缀辑。”

近人胡适,则更是完全否定《管子》为管仲所作。他说:“《管子》这书,定非管仲所作,乃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,和一些儒家的议论,和一些道家的议论,还有几多夹七夹八的话,并作一书……今定此书为伪造的,证据甚多。”不过,《管子评传》的著者梁启超,则认为《管子》一书“未尝为伪”。

总之,《管子》一书虽非管仲之所作,但它汇集管子学派思想,经数百年,前后相传,内容丰富,书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、经济思想及哲学观点,对于后世政治家、思想家影响至深。历史上,把《管子》列归道家者有之(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列入法家者有之(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列《管子》为法家之首),亦有人认为《管子》相同于儒家。在《管子》诸篇中,大大略而论,《君臣》《明法》《任法》《八观》等篇主要是法家思想,《地员》是农家思想,《弟子职》“全似《曲礼》”(朱熹语)属于儒家思想,《四时》《幼官》《轻重己》等篇是阴阳家思想,《兵法》是兵家思想,《心术上》《心术下》《白心》《内业》《水地》则是道家思想。上述分类,虽为大略而论,其中夹杂之处颇多,然由此可见《管子》是一部集古代思想大成的汇集,无论它对于墨家、道家、法家,还有儒家,都有其不可否认的深刻影响。

三、《管子》的思想

《管子》全书在总结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上,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。包括治国、法制、

经济、军事、教育等思想。

一、治国思想

治国需要开明君主,这是历代政治家们的共识。在君权至高无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中,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。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,国家的兴亡成败往往决定于一人。故《管子·小称》说:“天下者,无常乱,无常治。不善人在则乱,善人在则治。”一语道破了君主贤明与否对于国家昌盛的重要性。

除了贤明之君,治理国家需要贤能人才。《管子》在《七法》《中匡》《霸言》《五辅》等篇中都提到了重用人才的重要性。如“争天下者,必先争人”“所以取明广誉,厚功大业,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,非得人者,未之尝闻”。所有这些论述,都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。

在如何用人和怎样考察人方面,《管子》也有系统的论述,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见解:在《立政》篇中提出了著名的“三本”“四固”说。所谓“三本”就是用人的三项根本原则。《管子》认为“君之所审者三:一曰德不当其位,二曰功不当其禄,三曰能不当其官,此三本者,治乱之原也”。所谓“四固”,就是用人的四项根本政策。“君之所以慎者四:一曰大德不至仁,不可以授国柄;二曰见贤不能让,不可与尊位;三曰大罚避亲贵,不可使主兵;四曰不好本事、不务地利,而轻财敛、不可与都邑,此四固者,安危之本也。”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,是社稷安危之根本。

《管子》还十分重视对官吏的选用和考察。把有道之臣标准定为事奉国君有义,使用部下有礼;谈话则有所谋虑,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;遇危难或事变,虽死不悔;辅佐国君以义相交,以廉处事;并把官吏分成七种,即法臣(依法度断事)、饰臣(好名则无实)、侵臣(暗地破坏国家法令)、谄臣(多饰美女迷惑君主)、愚臣(办事自以为聪明)、奸臣(言人之恶发展自身)、乱臣(暗中对君主进攻)。

对于用人原则《管子》也有所论述,提出了“明主之官物也,任其所长,不任其短,故事无不成,而功无不立”。这种“任其所长,不任其所短”的用人原则,对中国历代用人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;《管子》在《立政九败解》篇中指出了君主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还应注意左右的舆论,排除邪说,以正视听。书中提出了九种败坏国家的邪说,并列举了它们的危害。指出了国君应当排除的九大危害,给政治家们敲响了警钟。

《管子》的廉政思想,也有其独特的见地。该书在《牧民》《形势解》《小匡》《权修》《重令》中都提到了廉政问题。在《牧民》篇中提到了国家有“四维”(即礼、义、廉、耻。),其中

“廉”为四维之一。这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。《牧民》中说,“廉不蔽恶”“不蔽恶,则行自全”。贯彻了廉的原则,即惩贪抑恶,可使国家走向大治。

爱民、教民、养民思想也是《管子》的重要内容之一。《管子·牧民》中说:“政之所兴,在顺民心;政之所废,在逆民心。”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,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来衡量。基于这种认识,齐国的政治家采取了爱民、教民、养民的措施,体现出了重要的民本思想。在《小匡》中说,“始于爱民”。《治国》中又说,“凡治国者,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,民贫则难治也。”为达到治的目的,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,要富裕必有具体措施。所以,管仲又提出了“六兴”的具体措施。一为“厚其生”,开辟四野,建造住宅,讲求种植,鼓励耕作。解决民生相关的问题。二为“输之以财”,开发财源,疏通积滞货物,修筑道路,便利贸易。三为“遗之以利”,修筑水坝防涝抗旱,兴修水利。四为“宽其政”,薄赋、宽税、宽刑、减轻人民负担。五为“匡其急”,即救民之急,关心百姓疾苦。六为“振其穷”,救助贫穷,给予饮食、衣服帮助。

为了推行道德教化,必须重视社会福利。为此,《管子》还提出了九惠之教,即“老老”“慈幼”“恤孤”“养疾”“合独”(鳏寡相配)“问病”“通穷”“赈困”和“接绝”(对死于战争的人士,领受一笔钱,负责祭祀他们)。这实际上是古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。

在论述到德和政的关系时,“凡牧民者,必知其疾而优之以德,勿惧以罪,勿止以力,慎此四者,足以治民也”。意即凡治理人民,一必须知其疾苦,二是要厚施德惠,三是不用刑罚恐吓,四是不强力制止。

在道德教育上,孔子是以德治国,以仁义治天下的代表。而法家极力反对以德治国主张。商鞅、韩非都认为道德不能富国强兵,并把道德作为危害国家的“六虱”。管仲及后学认为上述观点都偏激,在《权修》中详细阐述了道与法的观点,认为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纲纪。道、法二者缺一不可,并可互相补充,并在《正世》中说明了道与法在一定条件下,可以重点不同。古代的明君贤主刑赏各不相同,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,顺民心的变动而变动,做到了“不慕古,不留今,与时变,与俗比”。

二、法制思想

在先秦以法治国思想形成中,管子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性作用。

《管子》明确主张,“法者,天下之程式也。万事之仪表也”。任何国家都不能废法而治国。在《任法》一篇中,管子提出“所谓仁义礼乐者,皆出于法,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

也”。所谓有仁义礼乐,都是从法中产生的,用来统一国家行为。如果国法废弛不统一,国君不祥,人民不守法,国家擅改国度,大臣百官不以法办事和不以法律教育人民,都是不祥预兆。明确“法”具有全国的统一性、公开性和强制性,这似乎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先声。

《管子》还对法的特性和功用有系统的论述。

管子在《七法》《七臣七主》《法法》《任法》《君臣》《白心》《立政》《明法解》等许多篇目中都谈到了法律的特性。总体来说,主要有如下观点:一是强调立法的规范性,法律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,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,认为法是唯一的统一的标准;二是强调法的公正性,法律与亲亲、爱私的贵族传统相对立。法律一旦公布,就大于君主个人的意志;三是强调法律的公开性,《立政》中说:“正月之朔,百吏在朝,君乃出令,布宪于国。”说明了法律的宣明性;四是重视法的功用性,《管子》书中公开指明法律是维护统治秩序和利益的。《明法》中说:“凡人主莫不欲其民用也。使民用者必法立令行也,故治国使众莫如法,禁淫止暴莫如刑。”

三、经济思想

管仲被齐桓公任命为相时,就以称霸业为目标,他强调治国之道首先要富国富民。管仲在理论上阐明了富国富民治国称霸的关系,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富国与理财的具体措施。

管子在《治国》篇中说:“民事农则田垦,田垦则粟多,粟多则国富。国富者兵强,兵强者战胜,战胜者地广。是以先民知众民、强兵、广地、富国之必生于粟也。”《管子》的这段论述说明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,粮食多是强兵、广地的基础。《管子》在《禁藏》《牧民》《小匡》《乘马》《立政》等篇中都对农业作了论述。从这些篇目中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《管子》一书的农时观、粮食政策、农业税制、水利工程、林业政策等实施措施。

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,也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。把“工”作为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之一。他在《七法》中说:“财不盖天下,不能正天下;财盖天下,而工不盖天下,不能正天下;工盖天下,而器不盖天下,不能正天下……”即手工业不仅是致富的途径,而且是“正天下”的重要因素。

关于理财方面,《管子》中也有深刻论述。《权修》中说:“地之生财有时,民之用力有倦,而人君之欲无穷。以有时与有倦,养无穷之君,而度量不生其间,则上下相疾也。

是以臣有杀其君，子有杀其父者矣。故取于民有度，用之有止，国虽小必安；取于民无度，用之不止，国虽大必危。”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。说明百姓生产出的东西是有限度的。所以必须“取于民有度”。若统治者挥霍无度，必然造成国库空虚，故要求君主大臣们“取之有度”，即节制消费。

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（《牧民》）。管子认为，人民只有物质生活改善、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好日子，才会自觉遵守道德规范，懂得文明礼貌，具有荣誉感和羞耻心。

《管子》理财的原则，其中一项就是“取于民有度”。从这一原则出发，提出了“薄赋敛”的轻税主张。在《正世》中把重赋敛的危害性说的十分清楚：“重赋敛，竭民财；急使令，罢民力；财竭，则民不能毋侵夺；力罢，则不能毋堕倪。民已侵夺堕倪，因以法随而诛之，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。夫民劳苦困不足，则简禁而轻罪”。

四、军事思想

战争观在《管子》一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，其思想对后来军事家都有一定影响。管子认识到战争在性质上有“义”和“不义”之分，强调了战争性质对胜败起着重要影响。《管子·七法》说：“能强其兵，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，犹之不胜也。”书中指出“案强助弱，围暴止贪，存亡安危”。是“行义”战争。“行义”必能立于胜地，“不义”则会在战争中失败。它明确指出：“成功立事，必顺于礼义。故不礼不胜天下，不义不胜人。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，故王天下莫之敢御也。”

《管子》书中还提出了“作战内政以寄军令”的军政一体方略。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联为一体。规定了以家、轨、里、连、乡为单位的行政组织，然后又实行“五人为伍，五十人为小戎，二百人为卒，二千人为旅，万人为军”的军事组织同行政组织相对应的军政结合体。

《管子》特别重视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。强调首先要“布德诸侯”，做到“近无不服，远无不听”，对内要“治其民”，“为自用”。要“得众”有了群众战争胜利就有了保证。“得众”一定要“得其心”，使民众专一，同心协力，方可保证战争胜利。

此外，《管子》一书对军队建设中关于将帅、赏罚、军训、装备、后勤、战争策略方面也有精辟论述，为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五、教育思想

《管子》书中的教育理论，论述十分精辟，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

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”(《管子·权修》),就是管子的育人名句。

《管子》所述的教育是一种广泛教育,它包括了现代所分类的道德教育、职业教育、国防教育等社会教育。

在谈到社会教育的意义时,《管子·君臣下》认为:“明君审居处之教,而民可使居治、战胜、守固者也。”说明了教育对发展政治经济有促进作用。《管子·版法》中又说:“必先顺教,万民乡风。”《权修》中也说:“凡牧民者,使士无邪行,女无淫事。士无邪行,教也;女无淫事,训也。教训成俗,而刑罚省,数也。”充分看到了教育的巨大作用,通过教育可以改进社会风尚,稳定社会秩序,有时可代替刑罚作用。《管子·侈靡》中还提到了教育对人的感化作用,以及摧人向善、促人从良、健全体魄、文武兼备的作用。

道德教育也是《管子》教育思想的重要范畴。它提出了著名的自我教育八个原则。一是“反怠倦”。有积极主攻精神,不做惰。二是“忌伐矜”。仅对居功自傲,提倡谦虚处世。三是“过反于身”。检查自身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。四是“立中生正”。防止偏激,走上极端。五是“虚一而静”。加强自身内心世界修养。六是“周密慎言”。说话要分场合,慎重发言。七是“杜事于前”。道德不违反共同规范。八是“行小禁微”。从小严格要求自己,从一点一事做起。这些自我教育原则,对个人修身养性,至今仍有参考价值。

四、《管子》的影响

管仲及其学派,思想体系博大宏富,对社会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哲学、道德伦理方面都有深刻认识,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对此,萧公权在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第一编中指出,《管子》一书,所论霸政乃是“变态^①的封建政治”,重视家族宗法制度,不废人治且重礼教,尊君而不废顺民之旨,对于古代治国思想具有重要影响。

管仲思想是儒、道、法思想的先驱。故对荀子思想也有很大影响。荀子对管仲及其著作采取了既批判又接受的态度;荀子称赞管仲是“天下之大知(智)”“足以托国”。另一方面又批评他“未及修礼”,“力攻不力义,力知不力人,野人也,不可为天子大夫”。但他还是肯定了管仲其人,认为虽不是“大忠”,也称得上“次忠”。

管仲的自然观思想对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影响甚大。

① “变态”一词,在这里仅指“变形”之意,系学术用语,并无贬义。

管仲说：“天不变其常，地不易其则，春秋冬夏不更其节，古今也”。荀子继承这一思想说“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。管仲有“人君天地”的思想，即人以其能，善于“用道”“度天”“度地”“务地利”。管仲注意天时地利变化规律，探索利用天地自然条件，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理论，荀子在“人君天地”的基础上提出了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理论。理论突破了孔孟“天人合一”的观点。主张天人相分，强调了人的主观作用。

管仲主张礼法并举，强调“礼义廉耻”，乃“国之四维”，“四维不张”“国乃灭亡”，提出礼法是巩固政权的软硬两手。荀子也主张礼法并举提出“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规”，强调了礼与法的统一性，并互为补充。

汉代黄老学派也承袭了管仲的一些思想。《管子》一书中的《白心》《内业》《心术》上《心术下》四篇，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特征，即道与气、道与法、道与术及修身与治国的结合。

管仲是法家型的大政治家，是商鞅、韩非等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。因此，后世的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阐释管仲的法家思想。该学派不断完善管仲法治思想，继承了礼法并举理论，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制思想体系。

儒家学派在孔子之后以孟子为代表。孟子游于稷下学宫，吸收了管仲的某些思想。如重民，重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，与民同忧同乐等。孟子也重视民众生活，提出：“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”这说明孟子对管子思想有所吸收。又如经济方面，管仲主张“均地分力”，实行分户经营，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，强调生产者积极性。孟子也提出“制民之产”的观点，主张生产者有恒产，保护生产者的利益，调动劳动积极性。

兵家学派则充分发挥了管仲的军事思想，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。管仲学派重视战争，但决不穷兵黩武，认为：“贫民伤财莫大于兵，危国忧主莫速于兵”因此，不能轻易用兵。另外，在军队建设、军事战略上都有发挥。

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说，主要体现在《幼官》《四时》《五行》《轻重》等篇中。其中主要说明了五行相生的特色及“圣王务时而寄政”的根本性内容。即阴阳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，四时运行是根本规律，刑政和德政要适应四时。

建设和谐国家是《管子》所追求的最高国家治理目标。

《管子·兵法》说，“畜之以道，则民和；养之以德，则民合。和合故能谐，谐故能辑，辑辑以悉，莫之能伤。”大意是说，用“道”养兵，人民就能和睦；用“德”养兵，人民就能团结。

和睦团结就能协调,协调就能一致,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。《管子·立政》说,“令则行,禁则止,宪之所及,俗之所披,如百体之从心,政之所期也。”有令则行,有禁则止。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,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和谐地得以贯彻和落实,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。

《管子》的和谐思想还有着源于生命哲学的思考。《道德经》主张,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《管子》则认为,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,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。不仅如此,《管子》进一步认为,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,并且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。对此,《管子·内业》说,“人的生命,是由天给他精气,地给他形体,两者和谐地结合产生出来的。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,反之,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。考察‘和’的规律,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,它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。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,融化在心里,就是长寿的根源。”故而,《内业》进一步说:“和乃自生。”由此可知,《管子》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世界万物乃至于人无不产生于“和谐”的论断。

《管子》认为,只有和谐,国家才能安定,政令才能贯彻,社会才能长治久安。对此,《管子·形势解》说,君臣相亲,上下和谐,万民和睦,这样的话,国君下命令,人民就会执行;上面有禁律,人民就不去违犯。《管子·四称》说:“外内均和,诸侯臣服,国家安宁,不用兵革。”《管子·五辅》说:“和调乃能处安,处安然后动威,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。”《管子·白心》说:“和则能久。”《管子·度地》说:“天地和调,日有长久。”反之,君臣不相亲,上下不和谐,万民不和睦,这样的话,就会有令不能行,有禁不能止。令不行,禁不止,国家就要危亡了。对此,《形势解》说,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,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,上下背离而不和谐,有时虽然表面上看似安定了,实际上必将走向死亡。所以说“上下不和,虽安必危”“上下不和,令乃不行”(《管子·形势》)“大臣不和同,国之危也”(《管子·立政》)。

管仲重视治理国家、人民和谐生活的政治实践,设计了“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分业定居”的国家管理模式。士、农、工、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,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,并以之教育子弟,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,思想安定,不会见异思迁。因此,父兄的教导,不严刻也能教好;子弟的本领,不劳苦也能学会。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,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,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,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。这些举措的实施,稳定了当时人们

的身份、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,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总之,《管子》一书堪称为中国古代有关治国思想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,至今仍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富足价值。因此,本书主要选取了《管子》一书中有关国家治理思想的若干篇章。其中,大部分为全文选录,少数则为节选。需要说明的是,《管子》的治国思想内容有时略有重复。在先秦诸子中,《管子》亦不算是容易读懂的著作。对此,清代戴望所著《管子校正》很有参考价值。此外,郭沫若、闻一多、许维遹编纂的《管子集校》把前人研究成果汇集一书,颇便于学习、使用。

本书所选录者,则主要依据中华书局《新编诸子集成·管子校注》(黎翔凤撰,全三册,2004年6月版)。

(作者单位: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)